

发现之旅

随国青铜器破土而出

曾随之谜破解尚需时日

本报记者 杜洁芳

上世纪70年代,曾侯乙墓在湖北随州高调出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考古发掘出的多件青铜器的铭文向世人昭示着曾国的存在。可是这一真实存在的诸侯国为何却无文献记载?人们在不断追问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现——该墓的墓葬特征与文献记载中的随国在姓氏、疆域、时间上有着惊人的一致,由此引发了学术界持续多年的“曾随之谜”大讨论。曾、随到底是一国两名还是两个国家?专家们引经据典、众说纷纭,至今相关争议仍未尘埃落定。人们急切盼望着新的考古线索的尽现。

终于,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的发掘为解开曾随之谜带来了一丝新的曙光。2013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布了随州文峰塔墓地的考古成果。在一项项重大发掘成果中,一件带有随国国名的青铜器再一次振奋了人们的神经,它的发现是否意味着悬而未决多年的曾随之谜可以一朝破解?

文峰塔墓地出土始末

要想找到答案,我们或许要把视野拉回文峰塔墓地发掘的原点上来。2009年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到举报,称位于随州市文峰塔社区居委会二组的地块有文物,而且可能还有编钟。消息传来,考古人员立即组织人员赶往现场,对文峰塔地块进行了严密勘探,发现确有墓葬。随即考古人员对4号至7号墓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部分文物,并初步确定该墓群时间为春秋晚期至东汉年间。

3年后的又一个6月,该区民房要拆迁改造,文峰塔墓地又迎来了新的发掘时机。在新房动工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块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勘探。最终发掘墓葬65座,包括土坑墓53座,砖室墓12座,土坑墓大多为东周曾国墓葬,时代从春秋中期一直到战国时期,少数为战国晚期

的楚墓;首次在随州境内发现曾国车马坑,分别为两座车马坑和一座马坑,皆为春秋时期,出土的两马驾和四马驾,为揭示春秋曾国车马殉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此外,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青铜、陶、玉等各类植地的文物1000余件,其中青铜器占半数以上,种类主要有鼎、簋、甗、匜、盘、缶等,部分铜器上有铭文,且品相保存完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墓主的尸骸也被一并洗劫。

因为墓葬遭盗墓贼洗劫,墓主尸骸也被盗取而不复存在,礼器也仅存东穴一处。“从以往经验看,该墓除中室内陈放植地的文物外,东西南北四穴原本分别放置礼器、兵器、铠甲、车马器。但因早期曾遭盗掘,仅留存东穴的礼器,且品相保存完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墓主的尸骸也被一并洗劫。经分析,是由于逝者身上通常会佩戴玉器,贪心的盗贼为了防止宝物的遗漏,索性将墓主的尸骸一起偷盗出去。而由于礼器穴紧靠棺木,增加了盗掘的难度,才使礼器得以幸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对记者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M18墓坑,此墓形状与古时的“亚”字相同。与首次发现的“曲”字形曾侯乙墓有异曲同工之妙,丰富了湖北境内已有的东周墓葬形制。该墓南北长16.6米、东西宽15.6米,南端还有一个宽4米、长8米的墓道,墓葬开口面积达到217.5平方米。黄凤春说:“该墓与普通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不同,呈现出了十分罕见的‘亚’字形,这在随州还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它的东、西、北三面还发现了3个方形的副葬坑和多层台阶。这些都预示着墓葬主人的身份地位不一般。”

惊现随国国名青铜器

此次考古发掘更引人关注的当属一件带有随国国名的青铜器,因为它的出现似乎预示着曾随之谜的谜底开始隐现,尽管答案并不明朗。

在文峰塔墓地M21墓葬中发现的这个长21厘米、高15厘米的戈,清晰地刻着“随大司马猷有之戈”的铭文。黄凤春说:“‘随’是国名,‘大司马’是古代掌握兵权的官员,‘猷’是人名,此戈是几次发现曾国铭文铜器。从这来看,这次随国国名青铜器的出土对于破解曾随之谜意义重大。”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礼表示,这次只发现一件随国器物,且是在曾国的墓葬里,信息量还不够。“曾随之谜不会一朝破解,但这一发现起码会让大家重新审视已有的观点了。”

有的专家还表示,此次文峰塔墓地发现了带有随国国名的青

铜器,目前只发现这一件,且是在曾国的墓葬里跟曾国的青铜器一起被挖掘出来的,因此,它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如果说它有重大意义,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从一个墓坑中出土了曾国和随国的陪葬品,为“曾随合一”说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学术价值堪比曾侯乙墓

此次文峰塔墓地的考古工作科学地、完整地揭示了一批春秋中晚期的曾国墓葬。出土的大量文物和墓葬坑对判定墓葬国属及墓主身份、认识春秋曾国车马殉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文峰塔墓地的发现还对完整揭示曾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随州博物馆馆长黄建勋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揭示曾国的历史。1978年发现曾侯乙墓之后,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比如它分封于什么时候,整个历史发展轨迹是什么等。2010年12月,在叶家山墓地发掘的63

座墓葬,多数属于曾国贵族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上有“曾”“曾侯”“曾侯谏”,说明曾国在西周早期被周王朝分封了。此次文峰塔墓地发现后,我们想将这几次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为曾国的历史脉络拉一条清晰的线,所以它的价值非常大。”

黄凤春也表示,文峰塔墓地的重大意义有三点:其一,首次在随州境内发现了“亚”字形的大墓,丰富了对过去墓葬形制的认识;第二,首次在随州发现了春秋曾国的车马坑;第三,在随州境内发现了单独的马坑,这是过去不曾见到的。从以上三点看,学术价值在某些方面要超过曾侯乙墓。此次文峰塔墓地之所以受关注,还在于发现编钟,过去由于曾侯乙墓出土了震惊世界的64件编钟,使很多人认为只有曾侯乙墓才有编钟。其实在曾国比曾侯乙墓更早就有编钟,2009年,曾侯乙墓就曾出土一批编钟,而该墓比曾侯乙墓要早几百年。



文峰塔墓地M18墓坑。



M21墓葬中发现的戈,清晰地刻着“随大司马猷有之戈”的铭文。



M18东室器物。

文物扫描

中国古代铜炉：

实用中尽显吉祥富贵

钟 葵

四方神兽温酒炉

铜炉是中国古代铜器一个独特的品种,包括炭炉(又称燎炉)、温酒炉、熏炉、手炉等,这些铜制的炉基本上都是实用器具。和其他中国古代实用器一样,古代铜炉也是艺术品,并且深深地刻上了传统吉祥文化的烙印。

炭炉作天寒地冻取暖之用

地球有春夏秋冬,人类需要避暑防寒。炭炉,就是古人在天寒地冻时燎炭取暖的用具,类似于现在的火盆。所以铜炉最初的定义就是“盛火器”。炭炉在我国很早就出现,在商代墓葬中已有出土。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青铜文明进入高峰期,炭炉已是贵族阶层的日常用具。早期的炭炉多为圆形,下有三足,口沿外有链环作提携之用。

到了战国时期,炭炉的使用更加流行。该时期已知最精美和完整的炭炉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一组炭炉,包括取炭用的铜漏铲和铜箕,同时期所见的这类炭炉大体相似,多为直口、颈、浅腹、三足。此后,炭炉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家户必备的日常器具。由于制作技术的不断进步,后来的炭炉更加大型和豪华精美。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官殿暖阁里,都摆放着高1米有余的大型铜炉,而且大多是青铜鎏金、掐丝珐琅等精品。皇家御用的暖炉造型大气、纹饰精美,样子有点像大鸟笼,下面一般有3个或4个铜兽头造型的脚托着火盆,火盆上是镂空制作的网罩,既精美又能防止炭火爆出发火,设计非常巧妙,而瑞兽头也有防火的吉祥寓意。

古人不仅喜欢喝酒,而且喜欢把酒温烫了再喝。温酒炉,就是温烫酒壶的一种小型炭炉。目前所见温酒炉均为汉代出土文物。从功能上讲,温酒炉的设计非常合理,一般上都是酒壶,下面是炭炉,既能上下分开,又能合体合用,外表浑然一体。

汉代温酒炉常装饰有吉祥图案,如“四神”温酒炉由耳环、炉上部、承盘组成,炉体为长方形,上部有镂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围柱上有支柱,以承耳环,炉下有4个作背负状的人形足。“四神”的观念来源于天文学上的二十八宿,古人认为东方七宿有如青龙,西方七宿有如白虎,南方七宿有如朱雀,北方七宿有如玄武。这“四神”既代表着东西南北4个方位,又是镇守这4个方位的四大神兽,有辟邪、镇宅的作用。在汉代,“四神”的观念十分流行,汉人常将“四神”装饰在各种日常用具上面,如铜镜、铜炉等。

到了明代,熏和炉的功能开始分离,香熏炉成为达官贵人的奢侈品,火炉则专门用于取暖,成为大众化的普及品。明代香熏炉以宣德炉最有名,宣德炉又称宣德铜香炉,简称宣炉。

宣德炉是明代宣德年间由宫廷铸造的香炉,是用当时暹罗国(今泰国)的风磨铜,再配以金、银、铅、水银等金属炼铸。因造型优美、铜质精良,宣德炉有“宝色内蕴,珠光外现”之美誉。宣德炉的造型有三类:一是仿周商彝鼎,二是仿宋代官、哥、汝、定等名瓷,三是仿缸、罐、桶、瓮等日用器皿。宣德炉的色泽非常丰富,有黄色、红黄色、栗壳色、鲑鱼黄色、藏经纸色、蟹壳色、枣红色、猪肝色、甘蔗色、石榴皮色等,还有黑漆古色、仿古铜青绿色、石青斑色、渗金、渗银、泥金、泥银等,这些色泽都是寓意吉祥的色泽。

宣德炉的款识多铸在炉底,共有7种:一字款,篆书“宣”字;二字款,楷书或篆书“宣德”;三字款,横列“宣德年”;四字款,“宣德

年制”,又分扁方印款、圆印款、双龙四字款、双龙抱柱款等;六字款,“大明宣德年制”;八字款,“宣德五年吴邦佐造”;十六字款,“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正方印款。其中传世较多的宣德炉是带吴邦佐款的。

据史籍记载,宣德炉仅在宣德三年铸造过一次,一共5000只,以后封炉不铸了。由于宣德炉名冠天下,所以后世多有仿制,但无论怎么仿,其颜色、铜质都与真正的宣德炉相差甚远。

手炉图案多喜庆

铜炉之中最袖珍的是手炉。手炉也称“袖炉”“捧炉”,是可握在手中或隨身携带(带有提梁)的小熏炉,类似暖炉。这种小熏炉流行于明代末年至清代末年,是北方人冬季捧在手中或怀里捂着炭火取暖器。相传手炉最早出现在隋代。隋炀帝南巡到江苏江都,时值深秋,天气寒冷,江都县官许伍为拍

相关链接

曾随之谜众说纷纭

沈傲大

关于曾国其名,在春秋、战国的文献里,均没有记载。但是从宋代开始,却有曾国出土的青铜器见于著录。近10年来,在河南、湖北的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县一带的随枣地区,相继出土了不少曾国的青铜器。特别是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出土,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存在一曾国,毫无疑问。那么,这个曾国究竟在哪里?今天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曾国即是随国。理由是:其一,存在时间相符。《国语·郑语第十六》记述西周末年周人史伯语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说明随迟至西周晚期即已立国。而见于现存历史记载中的随国的最后一次活动,是与楚、陈、许等国联军攻伐蔡国,时为春秋末年。可见,随大约建于西周末年,亡于战国初期。对于出土的曾国青铜器考证鉴定发现,这些器物均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时物。据文献推知,汉淮间小国能维持到战国初年不灭的,只有随国,然曾国尚存,可见曾即是随。其二,所处地域相同。曾国器物出土地点,迄今以随枣走廊南端,今随县、安陆、京山之间较为密集。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在相同时期,这一带为随国所在地。随是随国国都所在地。按国君之墓,应葬在国都,因此曾即是随。其三,姓氏相吻。随是姬姓之国,史有记载。但1979年4月,距随县县城1.5公里处出土的季氏梁青铜器中有一季意戈,上有记载物主国别、官职及其与周王室关系的铭文,证实曾国也是姬姓国。其四,据《左传》记载,定公四年,吴、唐、蔡三国大举攻楚,打下楚之郢都,昭王败走奔随,随人庇护昭王,拒三国之兵。而曾侯乙墓发现,楚惠王曾制一套编钟,铸放在曾国宗庙祭祀曾侯。强大的楚国对小国之君如此敬重,很可能是与随人保护昭王事后有关,具有报德之意。可见当时曾国之君,是保护过昭王的随人后裔。其五,在古籍中,一国二名的记载很普遍。如河南附近的吕国又称蒲,山东附近的州国又称淳于,楚称荆,魏称梁,比比皆是。所以,曾很可能即是随。

另一种说法认为,考古发现的曾国,显然不同于文献记载的随国,而是史籍上的缙国或郢国。他们的理由是:其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墓葬不一定都在国都。许多小的诸侯国由于封地狭小,国君墓葬只能在国都附近。较大的诸侯国则有特定的国君墓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列秦墓的国君葬地,其中不少不在国都。曾侯乙墓在随,未必就能说随是曾的国都。相反,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记载,楚惠王是得到来自西阳的讎告因而为曾侯乙制作宗庙用的编钟等礼器,送到西阳进行祭奠的。可见战国初期曾的国都不在随而在西阳,即今河南光山县西南。其二,从文献记载看,随国是汉东姬姓国中较大的诸侯国,可谓“汉东之国,随为大”。但它从春秋前期起,逐渐沦为楚的附庸。战国初期资料中随已消失,极可能已灭亡。而曾国直到战国初期,还是个拥有较大经济力量的独立的诸侯国。其三,楚惠王为曾侯乙铸造宗庙礼器,给曾以很高礼遇,绝非因随人保护过昭王而报德,而是当时曾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楚王在政治斗争中的需要决定的。其四,把曾与随当作一国二名的解释,不妥。不能因商又称殷、吕又称甫,从而作出简单类比。当时一国二名,都有它的原因。多数是由于迁都,这在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但所有文献在讲到随时一律称“随”,而所有出土的青铜器又一律称“曾”,丝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国二名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春秋时期楚、随对立,楚武王3次伐随,第三次死于军中。而从曾侯乙墓的发现看,年事已高的大国之君楚惠王竟为小国之侯曾侯乙送了一份厚礼,说明楚曾关系很友好。如果曾即是随,则很可能是曾人在楚王恣惠下,混入随内,通过宫廷政变夺取随国,就像田氏伐齐一样。3个“谜底”,当以何者为是?看来尚难以定于一说。

消息长廓

新疆一墓地发现大量陪葬葫芦

本报讯 “20%以上的墓穴里有葫芦陪葬品,这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以前在新疆其他墓地里出土的多为陶器、铜器等,很少发掘出土过葫芦,有也仅是一两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室馆员艾涛日前表示,葫芦陪葬品是他近期参与新疆阿陶陶县克孜勒加依墓地考古发掘时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陪葬品。

克孜勒加依墓地位于昆仑山深处的叶尔羌河和恰尔隆河汇合处附近,周围为崇山峻岭。墓地恰在恰尔隆河西岸长约20米的断崖上,周围环境恶劣。考古人员抵达墓地,先要趟过河流,然后爬上悬崖。对此,艾涛表示,古人为何选择这样的地方修建墓地,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据艾涛介绍,用于随葬的葫芦有的放置于棺外,有的放置于棺内,多有切割、钻孔等加工痕迹,有的还保存有系葫芦的绳索。在汉文化中,葫芦代表多子

多福,同时其形状跟女人尤其是孕妇体形比较相似。艾涛表示,这是不是跟生殖崇拜有关,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与大多数墓葬不同的是,这里墓葬并无固定方向,而是依山势沿逆时针方向旋转,大致上分层排列,墓葬密度高,目前已发掘102座墓。

从墓地出土葬品来看,以四直腿箱式木棺和桶形棺最多。艾涛表示,这样的葬具在楼兰、和田、喀什莎车县都发现过,箱式木棺通常被认为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从服饰上看,这个墓地埋葬的死者多身穿毛毡制成的大衣、靴子以及棉布做成的衣裤,造型简洁朴素,其上未见任何纹饰图案。这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唐代帕米尔高原地区人们“衣服毡裘”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艾涛初步推断:这可能是一个贫民墓地,年代应在唐代前后,这是古楼兰人西迁抵达的最远的目的地。(王慧)

河南洛阳出土“官”字砖瓦残片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一处基建工地发现唐宋不同时期烧窑12座,据推测可能是当时为营造洛阳城烧制建筑材料而建的官窑遗址。

据了解,这12座烧窑由于时代不同,其大小、形制不尽相同。从窑室内出土遗物看,一座为烧制陶器的,其他为砖瓦窑。

此次发掘唐代烧窑共5座,残留有窑床、火膛、操作坑、窑门、烟道底部,窑室内出土物有外表面内布纹板瓦残片、莲花纹方砖残块、莲花瓦当等。宋代烧窑共7座,保存较好,均为马蹄形窑,由操作坑、窑门、窑室、烟道、烟室、

烟囪组成,烧窑大小不一,烟室、烟道略有不同。出土遗物有莲花纹瓦当、米格纹砖、白釉瓷器残片和酱釉瓷器残片等。

这处烧窑遗址时代从唐到宋代早期,延续时间较长。在其中一座宋代烧窑内,发现几块印铭有“官”字的砖瓦残片。文物工作者据此推测,该烧窑遗址可能是为当时营造洛阳城烧制建筑材料而建的官窑遗址。

专家介绍,这处烧窑遗址的发现,丰富了隋唐洛阳城遗址区内的建窑资料,为研究唐宋时期洛阳城的建造、修缮及建筑材料来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李锐)



西汉“四神”温酒炉。